

人类基因干预 技术伦理研究

程国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人类基因干预 技术伦理研究

程国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基因干预技术伦理研究/程国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 - 7 - 5161 - 0481 - 1

I. ①人… II. ①程… III. ①人类基因—基因工程—伦理学—研究 IV. ①Q78②B82 - 0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5799 号

责任编辑 冯 斌
责任校对 王俊超
封面设计 郭蕾蕾
技术编辑 王 超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45631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40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由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萧昆焘教授、王育殊教授创立，90 年代初开始组建一支由青年博士构成的年轻的学科梯队，至 90 年代中期，这个团队基本实现了博士化。在学界前辈和各界朋友的关爱与支持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自 20 世纪末以来，我本人和我们团队的同仁一直在思考和探索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团队应当和可能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怎样的贡献？换言之，东南大学的伦理学科应当形成和建立什么样的特色？我们很明白，没有特色的学术，其贡献总是有限的。2005 年，我们的伦理学科被批准为“985 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个历史性的跃进推动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经过认真讨论并向学界前辈和同仁求教，我们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贡献点定位于三个方面：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

以道德哲学为第一建设方向的定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伦理学在一级学科上属于哲学，其研究及其成果必须具有充分的哲学基础和足够的哲学含量；当今中国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诸多理论和现实课题必须在道德哲学的层面探讨和解决。道德哲学研究立志并致力于道德哲学的一些重大乃至尖端性的理论课题的探讨。在这个被称为“后哲学”的时代，伦理学研究中这种对哲学的执著、眷念和回归，着实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但我们坚信，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学术资源和学术努力。科技伦理的定位是依据我们这个团队的历史传统、东南大学的学科生态，以及对伦理道德发展的新前沿而作出的判断和谋划。东南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培养方向就是“科学伦理学”，当年我本人就在这个方

2 人类基因干预技术伦理研究

向下学习和研究；而东南大学以科学技术为主体、文管艺医综合发展的学科生态，也使我们这些9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次认识到，选择科技伦理为学科生长点是明智之举。如果说道德哲学与科技伦理的定位与我们的学科传统有关，那么，重大应用的定位就是基于对伦理学的现实本性以及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作出贡献的愿望和抱负而作出的选择。定位“重大应用”而不是一般的“应用伦理学”，昭明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只是试图在伦理学应用的某些重大方面和重大领域进行我们的努力。

基于以上定位，在“985工程”建设中，我们决定进行系列研究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严肃而审慎地推出以“东大伦理”为标识的学术成果。“东大伦理”取名于两种考虑：这些系列成果的作者主要是东南大学伦理学团队的成员，有的系列也包括东南大学培养的伦理学博士生的优秀博士论文；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并努力使这些成果具有某种特色，以为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东大伦理”由五个系列构成：道德哲学研究系列；科技伦理研究系列；重大应用研究系列；与以上三个结构相关的译著系列；还有以丛刊形式出现并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创刊的《伦理研究》专辑系列，该丛刊同样围绕三大定位组稿和出版。

“道德哲学系列”的基本结构是“两史一论”。即道德哲学基本理论；中国道德哲学；西方道德哲学。道德哲学理论的研究基础，不仅在概念上将“伦理”与“道德”相区分，而且从一定意义上将伦理学、道德哲学、道德形而上学相区分。这些区分某种意义上回归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但它更深刻地与中国道德哲学传统相契合。在这个被宣布“哲学终结”的时代，深入而细致、精致而宏大的哲学研究反倒是必须而稀缺的，虽然那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朱熹气象”在中国几乎已经一去不返，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的学术已经不再需要深刻、精致和宏大气魄。中国道德哲学史、西方道德哲学史研究的理念基础，是将道德哲学史当作“哲学的历史”，而不只是道德哲学“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它致力探索和发现中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那些具有“永远的现实性”精神内涵，并在哲学的层面进行中西方道德传统的对话与互释。专门史与通史，将是道德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纬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

证法是其灵魂与方法。

“科技伦理系列”的学术风格与“道德哲学系列”相接并一致，它同样包括两个研究结构。第一个研究结构是科技道德哲学研究，它不是一般的科技伦理学，而是从哲学的层面、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科技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学术研究，故名之“科技道德哲学”而不是“科技伦理学”；第二个研究结构是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研究，如基因伦理研究、网络伦理研究、生命伦理研究等等。第一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理论建构，第二个结构的学术任务是问题探讨，由此形成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之间的互补与互动。

“重大应用系列”以目前我作为首席专家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为起步，以调查研究和对策研究为重点。目前我们正组织四个方面的大调查，即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大调查；道德生活大调查；伦理—道德素质大调查；伦理—道德发展状况及其趋向大调查。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是努力了解和把握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推进和理论创新，为中国伦理道德建设提出具有战略意义和创新意义的对策思路。这就是我们对“重大应用”的诠释和理解，今后我们将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并贡献出团队和个人的研究成果。

“译著系列”、《伦理研究》丛刊，将围绕以上三个结构展开。我们试图进行的努力是：这两个系列将以学术交流，包括团队成员对国外著名大学、著名学术机构、著名学者的访问，以及高层次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为基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主题和主线，由此凝聚自己的资源和努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只能提出自己能够完成的任务，因为任务的提出表明完成任务的条件已经具备或正在具备。也许，我们提出的是一个自己难以完成或不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完成任务的条件尤其是我本人和我们这支团队的学术资质方面的条件还远没有具备。我们期图通过漫漫兮求索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建立起以道德哲学、科技伦理、重大应用为三元色的“东大伦理”的学术标识。这个计划所展示的，与其说是某些学术成果，不如说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为中国伦理学事业贡献自己努力的抱

4 人类基因干预技术伦理研究

负和愿望。我们无法预测结果，因为哲人罗素早就告诫，没有发生的事情是无法预料的，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信心展望未来，我们唯一可以昭告和承诺的是：

我们正在努力！

我们将永远努力！

樊 浩

谨识于东南大学“舌在谷”

2007年2月11日

序 一

孙慕义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文化、科学与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异样喧闹与嘈杂的时代,周遭的心绪浮躁、矛盾、利益冲撞和不安分几乎到了一个极端的尽头,人们从没有像今天那样期盼回归安静、祥和和冷思的精神田园。

重建文明史历来是人类的一个精神文化以及心灵洗礼的过程,作为生命文化和肉身的阅读者,人类在近百年之间一直隐隐不安,过多地创造过程的苦闷并再次陷入迷茫,似回念和观照海上的日出,那种震慑与自由感,让我们不禁感叹生物圈各种不同的复杂现象的维系与发展一直仰赖着它,那喷薄灿燦的万道朝霞就是生命的根。我们如此企盼的就是理解它的精神圈的功能以及围绕生命科学文化存在的伦理关系。

在这千年的文化星河里,有一个弱小的幽灵开始强大,它化成无数更小的幽灵,由其中一个最小的幽灵化作又一个时代最强大的幽灵;幽灵依然在散落尘埃,尘埃还在积淀,当尘埃中仅存留的精魂成为一个思想的胚胎,只要有足够的营养或文明的培养基的爱,新生的幽灵将战胜一切旧有的,借黎明的光照和精神的差遣,诞生并发育,如果在暗夜,它将照亮万物。人的知识与文化生命之前与之初,即由于这种幽灵的存在而存在,它叙事着人的性与人的意识的可能性,它指向未来的元素、分子、颗粒或碎片、段落,最后归为一种具有整体特征的知识结构。生命从根本上是一组符号,作为词语,它拥有了内部结构以及系统整体行为的对立、冲突与统一。我不知道用什么其他的词语来替代,“生命”哲学也涵括生命伦理学,之所以被我说成幽灵,是因为在我的凝视后,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意义、思想与声音,那个“能指”的音位只有一个,作为生命的概念和价值的“所指”一直被变化着——不是本身的改变,或者本身在改变;那个 life 只是一个声音,只是唯一的声音。

2 人类基因干预技术伦理研究

如果再次考量和追问时间的产生或品能,似乎没有人赞同,因为时间就是没有最终“解”和最后“结”的神秘谷,但正是它托起了生命,时间给了生命以可能,并在空间中显表生命的华彩。时间和空间给予百花盛开,给予泉水叮咚,给予莺啼虫鸣,给予人类文化符号的自由与历史漂变的任意性。问题在于,很少有人再愿意和欧几里得、普朗克、波尔、达尔文、哥德尔、高斯、爱因斯坦、薛定谔、普利高津等这些人一样,把“上帝掷骰子”和偷看上帝“创造世界的底牌”作为自己的科学赌博,或如斯蒂芬·霍金那样和上帝比心智。但我们必须要处理与自己所遭遇的由于疾病、健康、医疗引发的伦理纠纷和以生命权利为核心的文化战争造成的伤害。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发现了一门平易近人的哲学学科,它链接了生命科学技术、医学生活、经济社会、道德评价以及语言、情感和行为,这被命名为“生命伦理学”的新兴学科,这个历经千年思想与精神淬炼的幽灵,可以还给我们一个新的安宁和甜美。

我们不是把自己的认识局限于纯粹的意义,纯粹的意义是否存在,生命是否就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意义,人是否就是我们感觉的那个主体。我们无法再进一步超越自己的生命意识和意识范围内自身的存在,对于人的生命现象的认知和知识似乎已经穷极或必然穷极,再也不能够更换一种思维形式或取向、心智、价值观以及文化传统去重新定义生命。我们的能力不再提供更超越的智慧,只有服从于人的生命自体。

朴素地或回归式地怀旧,已经遭到过很多人的批评,戴维斯对于美好的过去与毫无吸引力的现在给予过历史哲学的定义,“不管这个”究竟是哲学的还是社会的规避或限制性话语,或者隐藏着对于反叛传统的愤懑,都反映在他的定义中。Simple nostalgia^①不是故意把后现代作为一个学术名词,而是作为心理的寄托,以及对于眼下文化与伦理冲突的策略性消解。戴维斯的苦心让我们必须反思,后现代道德文化的歧路上的郁闷以及重新选择或创造的艰辛。那种焦躁不安,那种冲突后的快慰,那种矛盾与内疚的心理,那种局促与不安,值得我们深思。

人们一方面对新生文化和新的创造感到惊异与茫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寻找适应性话语去应对各种事变。生命是由生命原体、文化体和相关体

^① Simple nostalgia 是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戴维斯的话语,意为“朴素地怀旧”。Fred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9, p. 19.

构成,生命存在,是以性伦理话题展开,然后是生殖、婚姻、生长发育、快慰痛苦、灾难福祉、战争和平、成功失意、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离合忧念,本来生命伦理与人文内容是胶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和长寿、保健、卫生观念和体制、经济、财富以及文化传统融汇以后,使这段探索和寻觅的生命历程成为一个迷惑、期待、探究与争论的文化历史断代。时间已进入知识成为知识对象的内在因素,我们无法理解“人”的出现,并且为什么常常由于内在的情感断裂把人的尊严瓦解,生理的、劳动的、言说的现代人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价值、环境与在宇宙中和历史中的位置。在医学伦理学研究中,十分关注现代人的三个哲学上的二元性,这每一个二元性都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人生的双重角色。首先,人是一个奇怪的经验——先验二元体,这是因为对有限者的分析源于对具体的人存在,即对生命、劳动和语言的经验事实的把握。人只有通过言语、有机体与创造的对象才接近为人,人又是使一切知识成为可能先验条件,真理的话语必须先于经验真理而存在,才能保证对有限者发现的稳定性。第二个二元性是我思(Cogito)和无思(Unthought),它是经验——先验二元性给人类主体设置的条件产物,我思不再是明察秋毫的顿悟,无意识也已成为无思的一种形式,福柯的无思就是马克思“异化的人”,人的实践背景是无思,才使思想和行动成为可能,我们的生存才有价值。第三个二元性是起源的后退与回归,起源是真正的历史问题,比如人和人性的起源、社会的起源,但起源常常后退,我们只能把希望寄予未来,起源就是正在回归的东西,起源通过时间变得可见,它径直退向未来,用“完成”来消灭时间,使我们从相反方向找到真理;回归,诸如医学的人文回归位于起源极端后退之中。

人类的价值观和理想,为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的道德行为提供了目标与方向,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有缺陷和很易于发生冲突的世界里,因此,必须用规则 and 标准提供生活的指导方针以求指导人们如何使个人与社会的发展符合人类的理想与价值观。按查尔斯·坎默的意见,这些指导方针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能为我们调整与其他人、与世界之间相互关系提供具体指导方针的规则;第二种则是那些指导我们思考在特定环境中应如何行动的规则。而医学伦理学恰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生活规则与原则,能使我们科学地、勇敢地面对选择困境,既实现我们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爱,又维系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探索和建设新的社会与家庭结构模式。

当代生命伦理学诞生的背景是,人性的迷失与人类社会的重新震荡,包

括人类内在的心绪和大气层,都随着文化漂变而涉移;精神哲学与精神科学,被简约化和现象化,医学自然科学化之后的医学人文复兴和医疗公正的民众的权利运动;人类需要理性地认识生命的神圣性和处理各种纷繁的医学纠纷或道德事件的艰难,特别在高新生命科学技术将改变人类传统以及对各种文化维度下的伦理关系提出挑战之后,必须释脱由此变革引发的种种困惑,建立新的生命伦理关系构架,从而稳定我们的生活秩序。

汉语生命伦理学研究,尚缺乏自主的学术个性与风格,从20世纪80年代后,即模仿美国和其他西语国家多数学者的问题式研究的方法,不注重与人类生命科学技术行为、事件、情感和语言的哲学研究和评价,对于道德哲学意蕴无意深入地开掘,丢弃了生命伦理学诞生之初的那种伦理神学的精神、神义之爱或思想追求,回避自由意志对人类文化行为的控制影响,同时,种族的、传统的、社会经济学的以及宗教信仰和基因伦理的关系,也没有精致地探讨。在基因伦理问题域,多年来我们一直热衷和纠缠于以下这些问题:基因信息和基因诊断中信息使用的公平性问题;隐私与保密;尊重基因缺陷者或基因缺陷的权利维护;基因检测和普查的策略;基因治疗的经济伦理和选择的原则;基因和人体性状增益的控制;基因技术的商业化、广告、相关信息和知识产权等。但我们并未最后解决它们,有些问题甚至是生命伦理学者自己使其复杂化和两难化。基因科学与技术是“显微人体学”,人的肉身不可脱离与精神统一的常态,物质的人体不能变得与人毫无关联;现象不能离开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可因为技术的进化,违背人类文明的跃升和善的意志,不能因为科学自由冲动带来“神圣恐怖”。另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我们使用的原则过于粗糙、简陋,缺乏厚实的理性淬炼,没有用人文地理视角进一步挖掘思想营养,因此,生命的道德哲学奠基羸弱,只能用“人是目的”这样苍白的辩词,应付惨烈的伦理绞杀。因之,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应该重新明确研究对象和方法,反思过去几十年的收益与失误。尤其对于如基因伦理这类专门问题的研究,就更不该混同于流行的程式,放弃哲学的思辨,缩聚于无根孤立的责任追逐,猎获几个唯有新闻效应的案例,穷于信仰和情感地剖解之后,随意挂附上标签,在语义上进行价值的评估。我们其实需要更丰富的成熟的伦理辩证和更有说服力的理性依托,来影响人类的文化、科学、政治与社会,并在一个高生命科学水平基础上,重建新的生活秩序和医疗关系。

程国斌博士历经几年不息耕作完成的这本书,就附旨了我以上的这个

愿景,在汉语生命伦理学界,准确地应用自己的生命科学知识,第一次以基因医学技术为载体,展示他的哲学直白,又自如地以逻辑思辨为主体,言说了他的观念、观察、观点,没有惧怕“善的脆弱”,用一种责任的沉思,完成了较为完整的有关基因伦理结构的叙事。阅罢,想到柏拉图对激情的指责,我想,科学自由的激情依然要如同抑制欲望一样,不能任其泛滥,因为激情不可能在认知上发挥作用,只有理智的因素方可以帮助人类理解和把握真理;当然,今天的人们并没有放弃激情,而是在科学狂飙的时代,饱含对生活和生命的深情,避开“无动于衷的和吝啬的生活”,去创造五彩缤纷的美丽新世界。

程国斌博士,是我的第一位生命伦理学硕士和博士,应该算是汉语生命伦理学界第三代学人。他具有同代学科青年不具备的医学和哲学双领域知识结构,在就读医学院本科的五年中,在学习生命科学和临床理论阶段,就对哲学和人文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阅读和啃食了许多哲学名著;毕业后又从事了几年的外科临床工作,获得了与病人交往的第一感,亲身体味了实践医学的伦理机制和功能以及人道医学的真理,并感受到临床生活的辛劳、苦涩、风险、爱和甘甜;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系统地精读了伦理学理论作品,拓展了自己的知识视野,搭建了自己独行的语境和思想幕帷;他长于思索和探究,常常陷入苦思与冥想,用聪慧的笔触写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文字,并同时表现出他丰富的联想和新锐创意。对一位刚进入伦理学前沿阵地的新兵,能有如此伟力和奉献,我始终系情于内。远离当下的浮华和躁动,独居于喧闹的尘世之外,安于哲人的贫困和清苦,对一位本来可以在临床外科大展鸿业的年轻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感佩的精神。我预祝同仁中如此几位汉语生命伦理学的后学,集合更多的年轻智者,鄙视急于名利的心态,甘于真哲学的寥寞,淡泊而铭志,坚实地立足于苍茫的大地之上,创造出生命哲学或文化的新精神世界的奇迹,并有更多优秀的富有学术个性的成果问世,改变我们当下的学风,历史地推进和进一步创立正在摆脱稚气的汉语生命伦理学。

2010年11月25日感恩节于南京贰浸斋

序 二

田海平

2010年11月25日,感恩节。东南大学“伦理学热点与前沿”研讨课,在南京将军山进行了一次学术散步。讨论的主题,是以程国斌的博士论文《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伦理研究》为例,对生命伦理问题进行研讨对话。

下述内容,是依据谈话所做的文字整理,且为该书代序。

—

田海平:现在大家聚集在将军山麓,让我们一起在散步中讨论程国斌的论文,或者以他的论文为“指引”,一起思考生命伦理学的方法、问题和未来。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山下的开阔地带。从这里,我们要穿越将军山。时序已转入深秋,秋色渐深,层林尽染,在这片明朗而空落的秋之画卷中,我们行进的道路也是弯弯曲曲,不知通向何方。然而,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那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我们试着“接近”对现代技术(尤其是人类基因干预技术)进行的某种生命伦理的精神穿越。

我们要探究的问题,和今天这个时代遇到的最为严峻的生命伦理现象密切相关。人们总是在对于时代的把握中,来理解我们自己的制作、劳动和自由生命,从而理解人自身和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命本质。生命有春华秋实,有潮起潮落,有春光明媚,也有阴雨绵绵,有生,有死,有永恒之向往,亦有大梦初醒之幻灭。生命的印迹、年轮以及岁月沧桑,都凝聚成为人类生命的时间性表出,有如一支“时代精神”之歌谣,它的主旋律必定是人之生命的“此在”。然而,令我们必得深思的事情乃是:今天,人之生命的“这一”存

在或“这一”规定,在他的生产、制作、技艺、道说、交往和劳动的自由生命之展现中,把人自身即人之生命作为对象。这是我们时代的“哲学”事件,其重要性超过了古希腊世界的“苏格拉底之死”和基督教世界的“耶稣·基督之死”。它通过人类基因干预技术使人之生命的自由展现,进入到了一种至为深层的伦理悖论:那使生命成为自由的“人类的制作活动”开启了对“创制生命和表出时间”的自由生命的生产干预。

我对于这种技术运用所展开的伦理前景的第一反应,是想起了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吟唱: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最为愚笨的时代;这是一个明媚的岁月,又是一个黑暗的岁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纪元,也是令人绝望的纪元;这是一个一切都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时代,也是一切都向我们封闭的时代。^①

狄更斯对时代的描述,用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恐怕最贴切不过了。我们今天是在彼此对立的各种体验中感受或者经历着时代的技术革命及其所带来的伦理困惑和道德两难。人类的技术在今天展现了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我们对于身外自然的控制,已经深入到物质粒子内部,例如科学家正在抓住“原子”为人所用;而我们对人自身自然的控制,亦深入到了人类基因图谱的详尽描绘,且表现出广阔的技术应用前景。但是,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对现代技术的应用也持有很大的质疑:那些看上去具有美好前景的技术应用,是否意味着人类道德世界的“黑夜”之降临?技术上的“能做”是否经得起道德上的“应做”的推敲与质疑?为人类在疾病治疗、身体强化和生殖选择等方面带来福音的基因干预技术,是否同样在伦理关系、道德生活方面能给我们带来某些难以应对的“干预”,或者毋宁是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上的“绝望”?

问题的关键,仿佛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技术”和“伦理”如何关联的问题,或者“技术世界”与“伦理世界”如何建立联系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一层

^① 参见[英]狄更斯《双城记》,高奋、陈妹波、张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上述文献的中译文为:“那是最美好的时期;那是最堕落的时期;那是智慧的岁月;那是愚昧的岁月;那是信仰坚定的时代;那是怀疑一切的时代;那是阳光明媚的季节;那是黑夜凝重的季节;那是满怀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天;人们拥有一切;人们一无所有。”引文依据英文原文做了重译。

面的技术与伦理的关联,在具体方式上,是由人类基因干预的技术筹划所进入的生命伦理境域,它涉及人类基因干预技术在其世界展现或技术谋划中如何进入或者如何应对源自人类生命本质或人类生命自由的伦理质询和伦理辩护,因而这个问题构成了当代道德论争和生命伦理学理论探讨的前沿问题。

那么,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海德格尔曾经说,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座架”,这种“座架”构成了现代人的基本生存规定。我们看到,技术已经主宰了整个世界,它规定我们的生活轨迹和生活道路。有人曾经提出一种非常悲观的“三段论”式的预设推理:

大前提:“人类必然灭亡”; (从一种绝对意义上,我们无法反驳这一论断)

小前提:通过技术进步,延续人类生命并最终取代人类生命的是“克隆人”;

(对小前提的补充:通过技术进步,延续克隆人的生命并最终取代“克隆人”的是“克隆人”与“机器人”混合的“智能机器人”;——如果从一种绝对意义上,我们亦无法对这一小前提给予有力的反驳)

结论:机器人或者智能机器人最终会取代人类(这是许多科幻影片对人类提出的警告,同时又是我们不大愿意看到且不会赞同的一个结论)。

人们或许会说,进行这种推理的人一定是“科幻电影看得太多了”。但在我看来,这一危言耸听的推论,尽管不可思议甚至不可理喻,但它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忧,即技术对人类文明以及对人之生命的控制,可能会出现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绝对”后果:它可能会使我们面临不可预料的“伦理灾难”。我们当然不愿意把事情想“绝对”;但是,现代技术至少在“人类基因干预技术”这一范例中,已经展露出通过技术的应用进行“克隆人”(或者“复制人”)、“强化人”或“干预人之自然生命过程”的“绝对可能”。于是,机器时代的明朗逻辑中,隐匿着“机器人”统治的幽暗身影。

我们要提前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人类的前景果真如此的话,在后人类时代,人类的道德前景和道德希望究竟是怎样的?这样的问题看似非常遥远,但理论上我们则不能回避。科学技术的发展起源于对自然的控制,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在今天,尤其在生命科学领域越来越大,已经进入到了基因层面的控制。我们今天开始接近于要思考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全新的人类境

遇。这个境遇就是:人用来控制外部自然的力量已经反过来开始控制我们自身。因此,围绕基因干预技术之应用的伦理讨论,不再限于针对技术层面的“能做”或“应做”;我们必须由此设想,在后人类时代的人类境遇中重新反思“人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人的本质,思考人的生命伦理之规定。

二

田海平: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产生及其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比如在辅助治疗、人体强化和生殖干预等领域所拥有的应用前景,既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技术革命或医学革命,同时也是一次引发人们伦理观变革的哲学革命。如果我们对这一技术的革命性质进行深入思考,就会透过它在技术上的变革,触及它在哲学思维方式上产生的深远之影响;亦即,它对传统的哲学世界观,以及由这种世界观所界定的人之自由、人性、尊严和宗教形而上学根基提出了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颠覆性的后果。这一后果就是:第一因的消解。

毫无疑问,哲学起于人的自我反省或自我认识,它要探讨事物是其所是的根本。在这样的探究中,传统哲学形而上学设置了一个唯一真实的存在,也即能够把所有存在归属于自身的那样的一个统一性的存在。传统哲学对生命的理解,是从这样一个作为唯一真实存在的本体世界出发来理解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而理解时间、空间、历史、过去、现在、未来,理解人在大地上的劳作、繁衍生息和本真自由,理解有限的人类生命在这个广阔无垠的宇宙中如何安身立命。这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世界观所设定的对事物根本之“是”的思考。它把生命的问题还原为“是”本身的本体论问题。在这一思维方式的支持下,哲学和神学在中世纪合流。而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理性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因此,在中世纪结束之后的启蒙运动的努力下,理性开始成为一尊新的“神”。它取代了“上帝”原有的地位。这个时候,人的本能欲望,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然规定(包括人的需求和欲望)和人的自由,成了现代性道德论证和道德辩护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它既是哲学的起点,也是哲学的终点。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技术,作为这种合理化的运思或筹划的现实展现,代表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展开了或者实现了的形态。换句话说,哲学形而上学对“第一因”的本体承诺或预设,在现代技术的“强求”和“座架”之支配和统治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至

为典型的体现和实现。

现代技术在今天所展现的世界图景,与传统形而上学所预设的世界图景,具有某种同质的类似。

比如说,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想了一种优生优育的正义的理想城邦,这是柏拉图勾画的一个形而上学的梦想或愿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技术所实现出来的生殖干预与柏拉图的优生优育的“乌托邦”做一个比照,就会发现:当形而上学尚停留在想象的世界之中时,它还是一种哲学,或者属于哲学的范畴;然而,当形而上学的人文理想蓝图,作为一种现实“工程”被展现出来或者被实现出来的时候,它便可能是“技术”或者“政治”。第一因无疑是哲学形而上学所设计且被描述成具有绝对支配地位的存在,也是形而上学在寻求存在之存在的这样一个基本规定中抓住不放的东西。这样一样东西一旦展现出来,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对意识形态同一性的诉求,在技术上就表现为一种技术“座架式”的展现。这是形而上学通过哲学作为一种意识之展现,或者通过技术作为一种意志之展现,能够建构或者进入人之“伦理世界”的可能性进路——这种同一性变成了一种绝对的普遍性,这种绝对普遍性使得现代技术具备了构造人之伦理世界的潜质。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形而上学的梦想和憧憬一旦展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和技术意志的现实运作,它恐怕不再会是一种美好的梦想或愿景。它是否会演变成扼制或扼杀人之生命自由的“梦魇”?我们不能否认人类曾经广泛遭遇过这种“善恶”逆转的悲剧命运。事实上,今天的世界实情,出现了同样一种令人忧虑的事实,此即尼采所说的“上帝之死”的情形,或者福柯所说的“人之死”的情形。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死亡”事件进行反省。不论是上帝之死还是人之死,要表达的其实都是那种专断的理性、唯一的本质和超感性绝对的消解,也就是形而上学的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和消解。这种消解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因的消解”。

第一因的消解,使我们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失去了传统哲学和传统伦理学所依凭的绝对基础和根源。我们不再拥有一个“唯一的道德”来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为。唯一道德的合法性的丧失,是同现代性和整个现代文明相伴而生的。我们在技术的座驾中和资本控制的逻辑中所面临的实际就是由于“第一因”的消解或消融带来的道德多样性问题,它使现代人不得不面临恩格哈特所说的“道德异乡人”问题。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思考的主题而言,意义在于:我们可能要在哲学上寻求一种突破,才能理解今天的技术及